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集《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10_施虐与受虐

作者: Weinberg 翻译: 杨春宇 来源: 〈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黄盈盈 译 类别: 论文集《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日期: 2005.07.02 今日/总浏览: 1/1711

潘绥铭主编: 《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

施虐与受虐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施虐受虐癖的社会学研究文献的回顾 (S&M; Weinberg, 1987)。从那时起这个专题的研究领域里又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著述。本文可以说是对上篇回顾的补充, 考察近年来关于S&M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著作。我原来的观点认为应当极其实际地把S&M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一观点至今没有什么变化。早期精神分析学者如佛洛伊德 (1905 / 1953, 1920 / 1961, 1924 / 1959)、Krafft-Ebing (1886/1965) 和 Stekel (1929/1965) 把S&M当作个人精神病态的证据, 其他作者拓展了这种分析方法, 可以视作对我的观点的支持。这些更为现代的作者反映出一个一贯的主题, 那就是S&M 依赖于意义而存在, 这种意义通过参与S&M亚文化而被以文化的方式生产、习得并加强, Gebhard 首先探索了这个主题 (1969), 其他学者1970年代晚期开始对之进行了发展 (比如Falk&Weinberg, 1983; Kamel, 1980, 1983a, 1983b; Lee, 1979; Magill, 1982; Moser, 1979; Patrias, 1978; Scott, 1983; Scoville, 1984; Spengler, 1977, 1979; Weinberg, 1978; Weinberg&Falk, 1980; Weinberg&Kamel, 1983; M. Weinberget al., 1984)。

近来关于S&M的文献包括问卷研究 (Breslow, 1987; Breslow et al., 1985, 1986; Moser&Levitt, 1987)、S&M出版物的内容分析 (Houlberg, 1991) 和性取向杂志上出现的文学和故事 (Baumeister, 1988b; Naerssen et al., 1987)、对涂鸦的分析 (Innala&Ernulf, 1992), 民族志 (Brodsky, 1993; Myers, 1992)、理论文章 (Baumeister, 1988a), 以及对该主题知识状况的回顾 (Breslow, 1989; Moser, 1988)。它们更进一步阐明了我在早先的文章中讨论过的话题和对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建议。

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首先, 我回顾了最近关于S&M的文献。其次, 我对一些S&M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话题进行了考察。在第三部分, 我评估了我们现有知识的状况并提出将来研究的一些路径。

近年来的成果

问卷研究

由于保密的需要，进入那些越轨亚文化时会遭遇到困难，这时匿名的问卷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见识。虽然施虐受虐癖的俱乐部和行为变得更公开了，但这只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对于施虐受虐者而言，仍然要顾虑到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和造成负面后果的可能，尤其是在他们身处异性恋社区的时候。因此研究者为了接近样本经常要依靠与同人杂志（contact magazine）以及其他施虐受虐取向的出版物的合作。这种方法不仅具备与大多数调查一样典型的回收率低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它把研究者和亚文化本身的距离拉得更远了，导致他们不得不依赖交往的记录而不是第一手的观察。然而，从问卷研究中我们还是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Breslow等(1985)在两种施虐受虐取向的出版物上印了一份40题的问卷。另外，他们还发了300份问卷给一份S&M同人杂志的广告客户，并通过一个S&M商店和一家S&M俱乐部把剩下的问卷散发了出去。他们还收到了一些对一份深入跟踪问卷的回应。他们最后的样本包括130个男性和52个女性。性别间的差异尤其能吸引他们的兴趣，因为以前几乎没有在施虐受虐癖背景下收集过关于非性工作者的妇女的信息。

Breslow等(1985)报告了许多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趣的对比。虽然两性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美国人平均水平，但是男性受教育水平比女性更高。据报告，两性在重要的他人（important other）面前都不介意暴露自己对S&M的兴趣。男性明显比女性更早认识到自己在S&M方面的兴趣，他们中间超过一半的人报告说在14岁以前就意识到了这种偏好。而在同样的年龄段只有五分之一的男性注意到施虐受虐的乐趣。在20—25岁之间，几乎90%的男性和60%的女性承认他们的S&M吸引力。虽然三分之二的男人说他们从小就对S&M有“与生俱来的兴趣”，但几乎有同样比例的女性报告说是被另一个人带进S&M来的。对于差不多百分比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接触其他人最普遍的手段是在施虐受虐的同人杂志上刊登广告（见Weinberg&Falk, 1980），其次是引导性伙伴进入S&M（见Kamel&Weinberg, 1983）。据报告女人拥有不同性伙伴的人数比男人要多，之前12个月的施虐受虐经历差不多是男人的两倍。然而，报告显示出研究中的异性恋男人对S&M性爱的投入程度比Spengler(1977)在西德的样本要高。

与其他作者（例如Weinberg, 1978）相比，Breslow等（1985）没有发现男人和女人在角色偏好上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另外，男性和女性在主导的、多样化的和服从的角色方面的分布都相当平均，虽然稍微有点偏向服从。极端的施虐受虐行为不太常见。两性对羞辱、拍击、自慰和主奴关系都显示出同等程度的兴趣。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对束缚（bondage）、紧缚、性感内衣、监禁（restraints）和口交更感兴趣，然而男人则略微倾向于强调疼痛、鞭打、灌肠和肛交。两性对男性的女性化都只有微不足道的兴趣。

在第二篇报告中，Breslow等（1986）以对几种问卷的回应补充了原来的数据，这些问卷散发了另外几份S&M出版物的广告客户、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男同性恋（gay）报纸、一种只有同性恋取向者订阅的施虐受虐出版物和一个紧缚俱乐部。在286个男性组成的样本中，272个回答者表现出了某种性取向。半数的男人可以划归异性恋，17%是双性恋，三分之一是同性恋。和他们前面的研究一样（Breslow et al., 1985），回答者中绝大部分没有对重要的他人隐瞒自己的S&M兴趣。异性恋和双性恋比同性恋更可能拥有重要的他人。虽然超过一半的异性恋和双性恋认识有S&M背景的朋友，然而男同性恋明显地更可能拥有涉入S&M的朋友和熟人。每个群体的大多数人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意识到施虐受虐的乐趣，和前面的研究一样，他们极为强烈地觉得这是从童年就有的与生俱来的兴趣。根据分类（例如“经常”主导、多样化，“经常”服从）的变动，与角色偏好有关的数据也显示出不同的结果。人们把S&M活动看作介于前戏和生活方式之间，认为它是促进性高潮的手段。报告中涉及到最近12个月以来S&M同伴的平均数，男同性恋者的数字最高，其次是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三个群体中，多数男人实际上都不会去找施虐受虐癖的卖淫者。

与Spengler(1977)的发现相似，大多数回答者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S&M活动持肯定态度。但是在同性恋样本中自我接受程度最高。在研究对象的生活里，沮丧不是主要的问题。

为了揭示施虐狂和受虐狂应该被视作相同还是不同的现象，Breslow(1987)分别开展了两项施虐受虐者的研究，二者都报道在同一篇文章中。在这两项研究中，他把问卷散发了给施虐受虐癖同人杂志的广告客户、S&M俱乐部会员以及登记在一家有施虐受虐癖倾向的商店的邮寄名单上的人。在第一项研究中，他询问了由64个男人和29个女人构成的样本，其中主导者、多样化者和被动者平均分布，以完成控制度量的Rotter内部比外部回归（Rotte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他发现虽然那些认为自己是主导者的人的分数比认为自己是多样化者和服从者的分数显示出更强的控制回归，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他的第二项研究抽取了77个男人和16个女人，他在研究中使用了Burger和Cooper控制度量的愿望（Burger and Cooper's Desirability of Control Scale）。他发现虽然主导者、多样化者和服从者在控制他们的环境方面都得分甚高，但名单中的主导者得分最高，服从者需要的控制程度最低。他试探性地提出，这些发现支持一种看法，即在施虐受虐者中至少存在三个亚群体，但是他提醒说这一点还不是很确定。

Moser和Levitt(1987)描述了一个自我界定（self-defined）的样本的人口特征、性行为和自我感觉，这个包括了178个男人和47个女人的样本原先是为Moser的博士论文而收集的。虽然Moser在研究设计中使用了问卷，但是他与一个西海岸S&M社区的成员们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在人群中颇有知名度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在Moser和其他填完了印在施虐受虐杂志上的调查表的人的亲自恳请下，这次研究的回答者包括了支持S&M的两个群体的成员。样本中的男性在三十四到四十岁之间，和Breslow等（1985, 1986）的样本中一样，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性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在男性样本中，极少有回答者认为他们自己完全是个主导者或者服从者。虽然三分之一的男人显示出对主导角色的偏好，同样百分比的人偏好服从者角色，但是样本中有超过44%的人选择两种角色的混合，这导致Moser和Levitt推断他们的样本“可以转换”（switchable）——与角色选择的多样化或者灵活性是一个意思。

男人们经历第一次S&M的平均年龄是23岁；“真正显露”的平均年龄是26岁。然而，样本中有四分之一在16岁以前就经历过施虐受虐式性爱。报告中最普遍的施虐受虐行为包括拍击、各式束缚、多种羞辱活动、鞭打和恋物行为。60%的男人报告曾扮演过角色，尤其是扮演主人/奴隶的角色。据报告，虽然参与有疼痛感活动的少数人数目也不算小，但

是象烙印和烧灼那样极度疼痛并有潜在危险的行为不是很普遍。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觉得S&M与非S&M的性活动一样令人满足或者比非S&M的性活动更令人满足，但是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报告说，这对他们的性快感而言“必不可少”。与在其他研究中一样（Breslow et al., 1986; Spengler, 1977），报告中很少有回答者觉得他们的S&M兴趣有什么不妥。

和Breslow等（1985）一样，Moser和Levitt（1987）发现S&M世界中的女人为数不少。虽然Moser和Levitt没有把女性子样本用作统计分析，但他们提及在他们的研究中，女人显露偏好并参与到S&M中来的年龄与男人大致相同。她们与男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更倾向于双性恋和服从角色，而且不如男人那么强烈地将S&M作为一场销魂的性遭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内容分析

对杂志资料的内容分析虽然在直接观察S&M场景方面比问卷法更远了一步，但是它提供了另外一种收集有用数据的方法。然而，这其中有个危险，组织数据和从对它们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反映出编码者的观点而不是反映出施虐受虐者们的感受，因为这种方法非常倚重于研究者在信息分类方式上的见识。也许最好还是把这项技术作为其他数据收集方法的辅助手段来使用。

除了对一个西海岸施虐受虐者俱乐部的47期杂志进行内容分析之外，Houlberg（1991）还进行了非参与观察，记录下一项俱乐部资助的节目的观众由什么人构成。他还和一些资深会员们进行了交流。杂志是这个俱乐部唯一一份被记录下来的有组织的历史，包括故事、诗歌、摄影图片和对行业聚会和会员报告的详细记录。俱乐部的内部事务同样在杂志上商讨。Houlberg用了描述性类别来完成数值型内容的分析，详细地叙述了留给不同类别的版面大小和各个类别的范例。他还使用了俱乐部开展的读者调查的结果来辅助内容分析，这些结果同样刊登在杂志上。

Houlberg（1991）把杂志的内容分解为七个主题类别：媒体评点、诗歌、S&M话题、信息指南、摄影图片、故事和有组织的活动。俱乐部有组织的活动在条目的数量上是最大的一类内容，几乎占了出版物一半的篇幅。故事占17%的篇幅，然后是摄影图片（14%），信息指南（12%）和S&M话题（2%）。杂志上报道的读者调查显示读者希望杂志继续办下去，并强烈支持大多数类别的内容。

Houlberg（1991）觉得杂志“可能有助于为俱乐部成员们创造‘共享意义’……俱乐部成员们‘共享’的经验被杂志逐年记录下来，成为一项遗产，使俱乐部的队伍逐渐壮大”（第180页）。然而，虽然他注意到俱乐部的构成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后期之间曾发生过变化，从主要是男同性恋到以异性恋的男人、女人和夫妇为主体，但是他没有考察这些变化可能对俱乐部成员的共享经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在俱乐部杂志的内容上反映出来。但是他坦率地承认，需要对这块有趣的领域进一步研究。

此外Houlberg（1991）还探讨了一个问题，杂志上表明，在俱乐部宣称的要帮助公众理解S&M的目标和它强烈地维护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保护的措施包括严格限制外人接触俱乐部和杂志以及杂志的内容。Houlberg承认这项研究的“主要弱点”在于他几乎没有量化的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杂志读者们的观点。

Baumeister（1988b）分析了连续36期Variation杂志，这是一个性取向的杂志，包括的主题很广泛，有S&M但并不局限于S&M，他选择了225封“有意地把疼痛、束缚和/或羞辱作为主要内容来呈现”的信件（第482页）。二次编码器（second coder）解决了编码中潜在的可靠性问题。在排除了微小的误差和疏忽之后，一开始，0.933的互编码器协议（intercoder agreement）被提升到100%。Baumeister表明这类研究有些潜在的问题，包括这些信是不是真的，它们有没有被修改过，是怎么修改的，它们的完备、准确和诚实性，以及其中的表述等等。他注意到一些信件表达的很明显是幻想，其它信件可能也在用幻想来修饰真实。因此，Baumeister明确地提出他分析的是各种受虐欲望之一，而不是对实际行为的考察。不过，这些幻想很有趣，它告诉我们受虐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是否可能与实际的S&M场景取得一致。

和Breslow等一样，Baumeister（1988b）发现，女人写的信里并没有显示出她们比男人更渴望受虐。事实上男性受虐者的信件还比女性受虐者的信件稍多一点。百分之三十九的男性受虐者在某方面显示出女性气质。在Moser和Levitt（1987）的样本中，差不多比例的男人有易装癖，Breslow等（1985）发现28%的男性偏好易装癖，25%渴望“裙装惩罚”（通过“强迫”一个男人穿上极端女性化的服装来羞辱他）。

疼痛是男性（70%）受虐者和女性（85%）受虐者的信件中共同的主题，在两个性别上都大约是在Moser和Levitt（1987）的研究中表现出这一欲望者的两倍，高于Breslow等（1985）研究中报告的比例（有51%的男性和34%的女性渴望疼痛）。Baumeister（1988b）发现，男性受虐癖者在信件里描画的疼痛感要比女性受虐癖者更为强烈。比较起来，Breslow等（1985）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和女性偏好拷打（torture）。

进一步分析写信者对于疼痛的兴趣，Baumeister（1988b）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描绘疼痛的情景上存在差别，就是说，疼痛是被任意地施行，还是作为对“确实的”或“捏造的”罪过的惩罚。

女性受虐者偏好想象（或者接受）由正处于关系当中的同伴施加的疼痛，以作为对真实的罪过（虽然通常都很轻微）的惩罚。相比较起来，虽然男性受虐者同样喜欢由当时的同伴来执行，但他们显得更喜欢任意的或者因一个无关紧要

正象其他研究(Breslow et al., 1985; Moser&Levitt, 1987; Spengler, 1977)中的个案那样,束缚受到大多数写信者的青睐。羞辱也很受欢迎,施虐癖者中76%的女性和91%的男性表达了这样的偏好。这个结果比Moser&Levitt(1987)和Breslow等(1985)所发现的要高一些,其中羞辱只受到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的喜好。Baumeister发现羞辱在男人和女人所写的信里表达的形式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羞辱涉及到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而男性的羞辱则涉及到失去地位。

Naerssen等(1987)研究了1970—1983年间出现在四个荷兰同性恋杂志上的136个描写主导—服从角色的“色情”故事。他们发现最普遍的主题是精神上的羞辱,其次是与服从的一方通奸,由服从者束缚、flagellation、口交,舔主导者的身体,以及爱抚服从者。在研究涉及的那段时间内,新的行动比如说兽交、拳交和使用amyl nitrate等伴随着包括淋尿在内的行动一起发生了突然的增长。在1970到1974年间,一方被强迫加入施虐受虐性行为的故事占所分析材料的50%,1975—1983年间则跌至20%。相似地,故事中的强硬(hardness)、暴力和残忍在这段时间的早期达到高峰,然后开始衰退。

Naerssen等(1987)通过将色情故事与对16个男性同性恋施虐受虐者的访谈加以对比,发现了许多的不同。虽然六个男人喜欢主导角色,10个人经常扮演被动者,但这种喜好只是相对而言,取决于环境、他们的情绪以及同伴是谁。这些被访者渴望接受身体上的羞辱,比如束缚和flagellation,还有精神上的羞辱。在想象的情节中强硬的和温和的元素都有,但是服从者比主导者更愿意提及后者,这与S&M故事所描绘的场景有所不同。虽然色情故事把高潮看作必不可少,但是这些回答者则声称这对他们并不重要。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虽然羞辱、束缚等等在想象的S&M情节中经常出现,但诸元素之间并不会很紧密地编排在一起。相反,场景展开的同时也决定了种种限制。

因此,男人们相信服从者应该能够随意地停止两人间的互动。这种安排显然运作得很好,因为Naerssen等发现在几百个案例中,主导者一方做得太过火的只有几例。回答者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在将幻想付诸行动,应该避免对角色过分投入。

Innala和Ernulf(1992)分析了1972到1984年间每周从火奴鲁鲁马诺市夏威夷大学的两个男休息室里收集到的涂鸦。记录下来的信息中有百分之十三可以归入施虐受虐的范畴。百分之七十一的施虐受虐信息表现出偏好服从—接受者角色,21%显示对主导—发起者的兴趣,2%是多样化角色,还有6%没有表现出偏好。信息中描写的行为包括肉体监禁、鞭打和言辞侮辱。作者承认,他们不能确定是男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写下了这些信息。他们推测在创作了这些涂鸦的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男施虐受虐者,并且对此给出了另一个解释:休息室对有施虐受虐癖的男同性恋而言可能包含着性吸引力,而那些找不到有受虐癖的女性同伴的异性恋男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男同性恋作为代替。

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研究涉及到与S&M亚文化成员的密切接触。通过深入S&M的世界,研究者能够观察到实际的行为并与施虐受虐者交流,从而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一块富有生命力的土壤。(Kamel, 1980, 1983a; Lee, 1979; Patrias, 1978; Scott, 1983; M. Weinberg et al., 1984)。但是做民族志研究有很多困难。对研究者最大的挑战是获许进入S&M世界,这可能就是民族志资料如此缺乏的原因吧。总的来说,在大多数中等城市里,想进入同性恋皮革性爱

(leathersex)的场景比进入异性恋的施虐受虐亚文化要容易得多。在同性恋社区里,同性恋S&M酒吧会很出名,而且除了一些私人俱乐部之外都不难进入。但除非在大都会地区可能会有例外,异性恋的施虐受虐群体几乎无处寻觅。即使在大城市里,除非有成员愿意为研究者作保,否则S&M群体也不容易找到,更不容易研究。与调查相比,民族志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在分析和资料呈现方面存在其固有的困难。它非常依赖于研究者的见识、敏锐以及创造力。

Brodsky(1993)提供了一份关于Mineshaft的回顾性民族志,那是纽约的一个男同性恋进行皮革性爱的酒吧,1985年被州政府关闭。他从一个参与者的视角描写了场景中的互动。他在文中的目标是回答一个问题:“去Mineshaft酒吧能为那些顾客带来什么?”(第234页)。他的答案是它可以减少风险,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经历过S&M的人面前实验S&M。Brodsky提及美国社会在教导男人了解同性情欲关系方面没有提供什么社会支持,他认为“S&M舞台潜在的作用可能就是这种缺失的补偿”(第237页)。他觉得Mineshaft填补了这种空缺。这个空间能帮助人们进行皮革性爱亚文化的社会化,发挥它作为“男同性恋的象征仪式活动焦点”的作用。

Brodsky(1993)注意到这个空间里的角色和仪式非常个人化、非常复杂,他觉得“Mineshaft接纳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话)个人的同性情欲的能力是它最有趣的一个特点。每个参与者在他的个人的意义上展演他自己的仪式,而Mineshaft发挥的功能就是用一套共同的设备、规则、象征和情绪把所有这些展演联系在一起”(第246页)。不幸的是,正如Brodsky承认的,因为Mineshaft不再存在了,他无法详细地描绘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理解在这个空间里如何通过象征手段来保持社会控制将对以往男同性恋皮革性爱亚文化的研究(Kamel, 1980; Lee, 1979)有所补充。

Myers(1992)以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式研究了非主流身体修饰(例如生殖器穿刺、铁烙、烧灼和切割)。他观察了某施虐受虐组织为旧金山S&M社区筹办的六个工作室,还出席了一个“生活在皮革传统中”的活动。虽然他研究的身体修饰者们包括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双性恋、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但回答者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施虐受虐的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虽然早先的研究者发现非主流身体修饰这种活动不是很普遍(例如Moser和Levitt在1987年发现样本中17.5%的人参与烧灼,10.1%的人有刺青,14.7%的人穿刺;Spengler[1977]报道说有7%的研究对象使用发热的物

体，4%的人使用小刀和剃刀片），Myers指出，这些永久性的身体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时髦。

在Myers进驻的工作室中，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女人。他指出即使是在男性穿刺的工作室里，女人也占到了观众的三分之一，而在女性穿刺的工作室中“45个观众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女人，其中颇有一些人是涉足S&M的女同性恋者”（第282页）。在切割工作室里“四分之三是女人，大多数穿皮革。和其他的工作室一样，人群的主体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第284页）。

虽然许多非主流身体修饰者强调他们做这种改变的审美动机，Myers还是认为“在改变身体这一个人决定的背后涌动着很明显的性偏好”（Myers, 1992, p. 288）。身体修饰还有其他动机，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过渡礼仪，此后始终相伴的疼痛会更令人时时记起，有人把它当作对心仪的群体的归属，视其为信任和忠诚的考验，认为这种考验对于施虐受虐者而言尤其重要，另外的动机还包括宗教 / 神秘的原因，以及为了让人大吃一惊。

理论文章

Baumeister (1988a) 从社会心理学中汲取了模型和概念，发展出一套与其他成果相配合的对受虐癖的理论解释。他的基本观点认为受虐癖是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暂时放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象征性的、自主决定的实体等他所谓的“高级自我意识”，而代之以“低级”的自我意识，把自己当作一具躯体，专注于肉体的感觉。这是一种丧失自我的方式，功能上类似于长跑、陶醉、吸毒或者冥想，可以让人逃避压力。施虐受虐者用疼痛、束缚、羞辱、幻想和扮演角色来辅助这一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受虐癖不是自我摧残，反而是对个人有益。

Baumeister (1988a) 的论文与框架 (frame) 分析 (Lee, 1979; Weinberg, 1978) 配合得很好。框架是群体成员用于定义和分类情景、环境、场合、身份、角色和关系的经由文化创造和转换而成的群体构成要素。比如说，当一个人接受了奴隶身份的时候，就会使用奴隶身份的构成“要点” (keys)、概念工具来定义、使用、转变和限制那个框架 (Goffman, 1974)，通过这个特定的框架来使身份获得有效性。羞辱、服装、道具都是要点的范例，拥有转变身份的象征性力量。框架使S&M参与者得以与真实的完整的身份分离，使他们逃离高级自我意识。正如Baumeister所指出：“变成另一个人比逃离自我更进一步……人们实际上并不会真的通过性游戏改变自己的身份，但是逃离自我的受虐欲望能够把身份变化幻想成确有其事的样子”（第43页）。

回顾关于S&M的知识状况

Breslow (1989) 回顾了关于S&M的精神动力研究的文献并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他批评它有很多不同的、常常是互不相干的解释，这些从小医疗样本中得来的解释显得过分的简化。他认为“缺乏共同接受的定义，导致不同的作者创造出自己的定义或者误用已有定义”（第269页）。Breslow认为他们都受到行为主义观点的影响，很少有作者直接去研究S&M，他们宁愿用更一般的对性异常 (sexual deviance) 的解释来代替。和过于复杂的精神动力学方法比较起来，行为主义的立场又显得过于简单了。他呼唤更为经验性的研究，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解释。

Moser (1988) 以帮助临床医生回答施虐受虐者顾客提出的问题为着眼点，回顾了如今S&M方面的知识。他简要地总结了从对施虐受虐者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的一些发现，指出他们和非S&M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强调“实行S / M的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精神问题，甚至那些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施虐受虐活动也没有造成与之相关的任何特殊问题”（第54页）。

前面的讨论更新了我以前对与S&M相关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文献所做的回顾 (Weinberg, 1987)。现在我要就那篇文章中探讨过的一些话题进行一番讨论，根据新的信息来对它们加以修正。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我们考察过的相对晚近发表的成果，它们所依据的研究也可能有些过时了。比如说，Breslow等 (1985, 1986) 的调查是在1982和1984年做的。Brodsky (1993) 的文章描写的Mineshaft酒吧存在于1979年春到1982年冬。Innala和Ernulf (1992) 研究的涂鸦收集于1972至1984年。Naerssen等 (1987) 的内容分析所考察的杂志出版时间在1974到1983年之间，访谈则从1983年开始。Moser和Levitt的分析依据的是1970年代晚期收集的数据。Houlberg (1991) 和Myers (1992) 的著作更近一些。实际上很不幸，即使是最近发表的材料所依据的研究也至少是10年以前的了。

S&M研究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话题

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对S&M的研究和理论化已经有了将近20年的积累，如今我们在许多话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研究S&M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它一个定义。这个任务乍看起来有些难度，因为正如许多作者所说，施虐受虐亚文

化内部的行为和身份千差万别。当然，确实有许多S&M的世界，群体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除此之外个人之间在偏好和口味上也各各不同（比如束缚、易装、言辞羞辱、灌肠、淋尿、粪便、鞭打，对疼痛的兴趣和忍受可以相当广泛）。然而，在排除了性取向和具体行为之后，其中还是存在共同点。Falk和我（Falk&Weinberg, 1983）曾指出如今美国S&M背景下的一些关键性特质：它是性爱的、各方同意的和娱乐性的。象休闲的或者其他类似玩乐的行为一样（Magill, 1982），它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幻想（Brodsky, 1993），所以也需要合作才能圆满（Baumeister, 1988b; Weinberg, 1978; Weinberg&falk, 1980）。另外，M. Weinberg等（1984）曾论及，要定义这种情形必须注意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既是性爱的又是S&M的，缺一不可。这最后一点要求参与者通过使用能赋予行为以具体的情景意义的社会界定，以特定的方式来“框定”他们的行为（Goffman, 1974; Lee, 1979; Weinberg, 1978）。如果不把S&M的行为和动机放到社会背景中来看待的话，就会犯“误框”（misframe）（Goffman, 1974）的错误，误解正在发生的事情（Moser, 1984）。

疼痛

疼痛被很传统地包含在S&M的定义当中（Ellis, 1903/1926; Freud, 1905/1953; Gebhard, 1969; Spengler, 1977）。Breslow（1989）Moser（1988）在他们的定义里把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痛都包括了进来。尽管一些作者试图强调疼痛对于施虐受虐者的重要性，但正如Gebhard指出的，进行S&M的人自己不一定会觉得它是S&M的核心，或者甚至可以说不是必需的。Baumeister（1988a）提出“受虐经验里并不是总是有疼痛”（第37页），而一旦有了疼痛的时候“似乎也会很小心地加以节制”（第37页）。Myers（1992）指出“SM并不一定涉及疼痛。有很多人喜欢用温和一点的方式，但仍然应该算作SM”（第302页）。Moser和Levitt（1987）指出了将疼痛定义为S&M的一部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a）性唤起期间疼痛感本身发生了变化，（b）对真正的施虐受虐者而言，不是所有的疼痛都能达到唤起的效应，以及（c）某些S/M经验（例如监禁）并不疼”（第322页）。Spengler（1977）和Moser（1979）发现“发生极端而危险的S/M实践的概率非常小”（Moser, 1979, 第54页），Moser更进一步显示，大多数他的回答者都只涉足“中等”的S&M互动，他们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并且他们相信他们的同伴也得到了极大的享受。Houlberg（1991）引述了一位S&M实践者写下的话：这种行为“不一定要对肉体动粗，也不一定需要疼痛、恋物——甚至不一定要有性！”（第175页）。Califia自己是一个实践者，觉得“S&M的基本动力是权力二分，不是疼痛”（Califia, 1979, 第21页）。相似地，Kamel和我在讨论了S&M实践者对许多种无痛苦行为的偏好之后，提出“是暴力的幻象而非暴力本身时时唤起着施虐者和受虐者。S&M的核心恰恰不是疼痛而是操纵——主导和服从”（Wernberg&Kamel, 1983, p. 20）。

可见，疼痛对S&M并不是必需的。然而在很多S&M场景中的确存在疼痛。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它的功能是什么？人们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答案。Ellis（1902/1926）指出疼痛是一种性刺激。Gebhard（1969）同样强调疼痛的唤起特质，同时很小心地指出对施虐受虐者而言疼痛有许多种意义。Mass（1979）推测疼痛能引起内啡素（endorphins）产生，这种物质可以导致欣快感和幸福感。Baumeister（1988a）相信疼痛对S&M实践者的功能也许是“作为解除高级自我意识、提升作为肉体的低级自我意识的技巧。疼痛把自我意识从象征性的身份降低到肉体层面”（第39页）。M. Weinberg等（1984）对一些施虐受虐情景下的疼痛做出了一个更社会学的解释。他们注意到疼痛常常被用来表示主导和服从。事实上对一些S&M的实践者来说这也许就是最主要的吸引力。对一些人而言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它象征的东西（即一个人完全操纵另一个人或者完全被操纵在另一个人手中）才是充满情欲的。Moser（1988）解释说，“种种设计出来的行为，无论是身体的和精神的，强调的重点都在于权力从服从者向主导者的转移。S/M的实践者常常报告说，默契的权力交换才是充满情欲的，而疼痛只是达成这种交换的一种手段”（第50页）。

我的目的不是要否认疼痛对某些S&M实践者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抹煞疼痛被情欲化的可能性，只是想指出那些专注于疼痛的定义恰恰遗失了S&M的真正要点，即主导和服从的仪式化。它富含象征色彩并强烈依赖于共享意义，这些意义经由亚文化习得，可以帮助人们组织S&M互动。

主导和服从

正如许多作者曾指出的（Califia, 1979; Gebhard, 1969; Kamel, 1983b; Scott, 1983; Scoville, 1984; Weinberg&Kamel, 1983; M. Weinberg et al., 1984），理解S&M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关键在于把它视为主导和服从的形式。为了强调这一点，Scott（1983）和Scoville（1984）使用了D/S（主导和服从 [dominance and submission]）一词来指代异性恋的S&M场景。Houlberg（1991）则交替使用了S/M, D/S和B/D（束缚和管教 [bondage and discipline]）等概念。他注意到施虐受虐实践者把D/S当作一个包含了S&M的更广泛的概念。然而，对主导和服从下面隐藏的主题却有不同意见。一些作者把操纵的一面作为核心（例如Weinberg&Kamel, 1983），而其他人（例如Myers, 1992; Scoville, 1984）强调信任。M. Weinberg等和我（Weinberg, 1978）都强调主导和服从中涉及的幻想因素。似乎最准确的做法是在讨论S&M时把三个因素都包括进来，尽管各因素不一定同样重要。

虽然自我作为主导者或者服从者的观念对S&M场景中的某些参与者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许多作者都发现场景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人在角色选择上很灵活，“可以转换”（Breslow et al., 1985; Califia, 1979; Gebhard, 1969; Kamel, 1980; Kamel&Weinberg, 1983; Moser, 1988; Moser&Levitt, 1987; Naerssen et al., 1987; Spengler, 1977; Wtinerberg, 1978）。因此，似乎对许多人而言，一个人具体的角色并不重要，行为和场景才是最关键的。（Kamel&Weinberg, 1983）。

限度、幻想和操纵的话题交织在一起，而且都在某个方面与关于信任的话题相联系。研究者、理论家和S&M实践者共同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是主导者还是服从者操纵着S&M的情节？虽然一些实践者觉得服从方应该能够操纵互动，因为双方都不可能事先知道限度何在（Naerssen et al., 1987），但是看来这种观点并没有很准确的描绘出场景中通常发生的事情。也许对发生的事情的最切合实际的描绘是主导者和服从者都在积极参与情节的发展（Califia, 1979; Kamel, 1980; Kamel&Weinberg, 1983; Lee, 1979）。在一个S&M场景中行动常常被修正，是共同完成的，尽管不总是如此，但是很显然在通常情况下无论主导者还是服从者都没有绝对的操纵能力。

虽然在开始S&M前，彼此不是很熟悉的实践者们通常会讨论限度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景展开之时他们一定会恪守这个限度。限度的设定和修改变化很大，从极其随意到非常刻意的都有（Lee, 1979），因而有些情景为改编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另外，情节是一个互动的情景，每次的展开都不一样，因此，每个伙伴的反应被别人诠释和回应的方式也就不同，这部分决定了会发生什么。实际上，限度是“在游戏过程中决定的”（Naerssen et al., 1987, p. 118）。控制互动的信号往往不通过言词，相当微妙。在一个场景里通常需要对主导者的小心和敏感有相当的信任才行。比如说，我曾在纽约市的一家名叫“戏水”S&M俱乐部观察到如下的互动：

当我们走进俱乐部的时候，一个场景正在展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正躺着，被皮带绑在桌子上。他的腿、生殖器、胸、和上臂都被黑色细皮带捆了起来。只有肘部以下的下臂和手可以自由活动。一个穿着黑色皮装的主导者正在用鸡鞭在鞭打他的腿，那是一种大约一英尺长的小九尾鞭。她挥鞭很慢，每打一下都会在他腿上拖过。她只用肘以下的手臂挥鞭，不会转动肩头或者腰部来发力。她打中了他的睾丸，他颤动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话，只很慢地举起手来盖住了生殖器部位。主导的一方不发一言，轻轻地挪开了他的手，解开了阴茎和睾丸的束缚，把他的前臂绑了起来，然后慢慢地把鞭打的部位移到了胸前。

许多S&M场景至少包含着一个虚构（即幻想）的操纵元素（Kamel, 1980; Magill, 1982）。在幻想的框架内，参与者努力保持着现实的幻象，在向一个场景转变过程中，调整非常精巧，要保持服从者始终处于主导方意愿之下的假象，正如下面这个例子说明的：

三个主导的女人正在为一个场景中的服从者做准备，她们把他的腿绑到一起，把绳子的另一头扔到离地六英尺高的墙壁上的一个钩子上，然后开始拽着腿把他倒吊起来，不过他的上半身还在桌子上。两个女人以几不可闻的耳语问他有没有不适，他点点头表示他很好。

在展开幻想时可能会依照生理上的考虑来决定限度，比如说疼痛的最大忍受力。制约限度的另一个前提则牵涉到在编制剧本和设置限度方面的清晰和详细程度。这可能会依照亲密程度而变化，比如在与知根知底的情人互动的场景中双方最为亲密，限度可以放得很松，而在与陌生人相处的情景中限度就会控制得严格一些。经常性的互动中具体规定会比较少，不仅是因为熟悉度在增加，还因为发展起了信任。

信任这个主题对S&M实践者很重要。Myers（1992）观察到S&M的非主流身体修饰者在烧灼时有两种类型。其中有一类是“烧着玩”，“沿袭了SM传统上相互信任的一面以及具有疼痛和/或伤害的威胁（着重为原文所有）的一面，但是不会故意留下烧灼的痕迹”（第304页）。信任不仅存在于同伴间已形成的关系中，也许还被整合进了S&M亚文化的结构当中，尤其当行动者彼此相对陌生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些作者曾经提到，一个人要考虑到他在亚文化中的声誉，认识到这可能会影响到他在伙伴中的人缘，因而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Lee, 1979; M. Weinberg et al., 1984）。与信任相联系的是安全，包括伙伴、行为和道具的可靠性（Houlberg, 1991; Myers, 1992）。

身份

对S&M身份的获得和忠诚是我们现在知之甚少的一个领域。这里有两个独立的方面：S&M欲望或偏好的成因（etiology）和将这些个人需要转变为特定身份的过程。精神动力学试图解释施虐受虐欲望的发展，这种解释与社会学的解释颇为不同，后者关注的是一社会过程，即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需要，找到其他同好将这些需要付诸实施，发展出“主导者”（“顶子”、“主人”、“女主人”）或者“服从者”（“底子”、“奴隶”）的自我观念的过程。

从一些初步的社会学研究来看，精神动力学说似乎与很多S&M实践者身份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Breslow, 1989）。例如，Moser和Levitt（1987）发现他们的样本中只有18.6%的人回忆起小时候遭到惩罚时会引起性兴奋。Moser推论说，“结果既不支持也没有否认这种行为的发展性成因”（1979, 第75页）。Breslow等（1986）在他们的样本中只发现5.4%的人觉得儿童时期遭受过性虐待，只有四分之一出头的人宣称受到了心理上的虐待。M. Weinberg等（1984）不否认传统医学模式“准确地代表了某些人”，但是正如Kamel和我所做的那样（Weinberg&Kamel, 1983），他们争论说“这种观点并不能适用于大多数贴有‘S&M’标记的人和现象”（M. Weinberg et al., 1984, 第380

页)。然而,以这些还不确定的发现来低估精神动力学在解释S&M成因方面的重要性的做法也是不成熟的。

Patrias(1978)与Kamel和我(Kamel&Weinberg, 1983)指出发展S&M身份是互动过程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涯”(career)。那些发现了他们的施虐受虐式的感情和欲望的人必须找到另一个同类。然后他们必须学会建构和操纵S&M情节。他们通过社会化学习到具体的规范和价值。整合进S&M亚文化以及把自身身份调适到S&M实践者这两个过程看来是正相关的。Spengler发现“在亚文化整合(通过参加施虐受虐聚会的频数来界定)与在同伙伴发生关系时意识到越轨的可能性之间表现出许多显著的相关,这种相关与自我接受有联系”(Spengler, 1977, p.450)。Breslow等(1985, 1986)与Moser和Levitt(1987)同样在S&M实施者当中发现了高度的自我接受。

一些以前对施虐受虐的乐趣没有任何意识的人也会通过种种关系卷入S&M。例如,嫁给一个有主从兴趣的男人的女人可能最终会被引诱到S&M中来,甚至还会以此为乐(Kamel&Weinberg, 1983)。在Breslow等的研究中(1985),超过60%的女人都是在别人的介绍下加入的。当然,对某些特定的欲望和身份的起源以及认识到它们的过程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的另外一些方向

我们对S&M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建树和经验研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性文章很少,而且关注的面都太窄。迄今对施虐受虐者只做过少量的抽样研究,还都在十年以前了(Breslow et al., 1985; Breslow, 1987; Moser, 1979; Spengler, 1977)。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有理论框架指导的实地研究,收集经观察和访谈得来的资料。

我们对S&M的知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对许多方面的信息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其中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问题是艾滋病的危险如何影响了S&M社区。现有的文献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过去只有Houlberg(1991)提及在他分析的施虐受虐杂志中“与艾滋病有关的健康问题都得到极大的关注”(第176页)。在一些群体中,S&M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生殖器性交的受欢迎的替代物。对于一些施虐受虐者来说,生殖器高潮在S&M场景中并非必需(Naerssen et al., 1987)。S&M实践者常常讨论“某种身体修饰或者扮演技巧是会降低生殖器高潮呢,还是会在心里引发同样的颤栗(‘头脑高潮’[head orgasm]),或者两者都有?”(Myers, 1992, p.304)。我想知道施虐受虐者社区是否经历过一个变化,从可能引起流血的实践转变到不那么富有侵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拍击或者言辞羞辱。

还有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领域是S&M关系。Scoville(1984)宣称在S&M人群里面“极少有处于同居关系中的”(第33页),而且“因为没有社会支持,虽然支配性的关系的确存在,但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第35页)。Breslow等(1986)指出在他们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有一个可以对之公开S&M性兴趣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回答者与这些重要他人保持着有规律的S&M关系。Moser(1988)和Myers(1992)曾指出存在着S&M夫妇。

象征的应用是S&M亚文化中一个的重要元素。在那个世界里,某些特定的元素会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衣服上的饰物,这些意义通过文化被生产、习得和加强。杂志可谓图解了这种象征主义,它们着力刻画身着标准装束的S&M参与者,通常穿的不是皮装就是橡胶服。女人则往往穿着紧身胸衣、吊袜腰带和高筒靴。虽然在社区里这些装束显然有超出个人特殊意义的共识存在,但是在S&M亚文化里,它们对于S&M参与者的意义还未曾得到探究。

结论

虽然个人和S&M性爱场景得到了一些关注,但是产生这种行为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兴趣。如果研究的焦点从个人转移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那么“为什么某些人会变成‘施虐受虐者’”这一基本问题也应该随之转移到更具社会学味道的问题上来:“S&M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提这个问题可以换另一种方式,“鼓励或者允许这种性爱表达方式的社会是怎么样的”?这也正是Gebhard(1969)所提出的问题。他声称S&M(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在发达文明中才找得到。虽然他承认咬噬和抓挠也会作为性行为的一部分存在于前文字社会,但“引人注意的是那里并没有发达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S&M”(Gebhard, 1969, p.80)。他假设“也许可以说,一个能够把无可逃避的压抑和人生挫折象征性地在S&M中表达出来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并强烈地倚赖象征的使用的社会”。Baumeiser(1988a)关于受虐癖的也论文作出了类似的假设,认为现代的压力和责任变得繁重不堪,驱使个人逃离自我。

可以审视一下S&M的关键特征:它是性爱的、各方同意的、娱乐性的。它非常依赖于操纵的幻想和幻象,要求协作和共同定义以满足所有的参与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与这个领域相关的另外一些线索来继续我们的探究,以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前面的讨论为基础也许可以作出推测,那些可以把个人的施虐受虐兴趣制度化成为S&M亚文化的社会,也一定符合如下的标准:(a)文化中体现出种种主导-服从关系,侵犯具有社会价值(Gebhard, 1969);(b)在社会类别(比如性、社会阶级)等等中存在着发达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这可以使它被反转的暂时性幻象富有性爱上的刺激(Kamel,

1980; Lee, 1979; Weinberg, 1978); (c) 人口中至少有某些人群享受到了充足的物质生活, 使他们能够寻欢作乐 (Falk&Weinberg, 1983); 并且 (d) 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鼓励, 被认为有价值, 剧本和幻想在S&M中的重要性可以证明这一点 (Lee, 1979; M. Weinberg et al., 1984; Weinberg, 1978)。[1]

[1] 原文《施虐受虐癖研究: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相关文献回顾》, Thomas S. Weinberg, 翻译: 杨春宇。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 (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